



写下在战火中成长的英雄少年

——读近期抗战题材长篇儿童小说

□ 韩进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近期出版的抗战题材的长篇儿童小说中,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方冠晴的《二月谣》、李鲁平的《江上谁家少年》、曾有情的《我本苗壮》和任富亮的《守书人》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为如何讲好抗战历史中的儿童故事做出了新探索,展现了新面貌。

全方位多层次展现全民抗战壮阔图景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至10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先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武装力量。

《二月谣》以1938年江西、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处的新四军抗战为背景,讲述三位少年加入黄梅少年抗日先锋队,捣毁日军机场,成为新四军战士的故事。《江上谁家少年》仿佛是《二月谣》姊妹篇,在时间上有连续,在内容上有关联。作品讲述的是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日军在湖北长江段三江口建造机场,发起武汉方向的沿江轰炸,给长江流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灾难。孩子们奋起抗日,依托长江流域江湖河汊的复杂环境,加入打击侵略者的游击战争。《守书人》写武汉沦陷后,国民党政府迁址重庆,在上海“孤岛”仍然坚持抗战的进步文化人士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以旧书店为掩护,培养具有版本学、目录学知识和甄别珍本善本能力的少年阿煦。阿煦在版本学家、藏书家、进步文化人士谭先生的影响和引导下,在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抢购中华文明典籍的商战中,逐渐成长为抗日爱国的文化战士。在看清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以后,他们毅然决然地将全部藏书交给“为百姓着想的政府”,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守护着中华文化的根脉。《我本苗壮》写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日寇向八路军根据地发起疯狂扫荡,八路军某部三团长徐明亮和儿童团长苗壮上演了“上阵父子兵”的英勇杀敌故事,共同消灭了日寇在盘龙镇据点的吉野大队,又奔赴“把鬼子赶出中国”的新战场。

四部长篇儿童小说通过讲述根据地、沦陷区和上海“孤岛”等地八路军、新四军、文化界的儿童抗战故事,多层次展现了中国人民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抗战决心与坚定意志,表达了全民抗战的壮阔图景:“大中华,巨龙醒,龙抬头,一声吼,四万万的同胞们,团结起来去抗日,为了国家和民族,消灭所有侵略者。”

英雄的少年在抗战的烽火中成长

作为一部反映八路军抗战的儿童小说,《我本苗壮》将抗战宏大历史浓缩到少年苗壮的成长故事里。苗壮是八路军夫妻的孩子,4岁那年日本军队扫荡八路军根据地,父母不得不将他送到偏远山村的一户农家避难,因为村里汉奸告密,苗壮的养父母大柱和英子将自己的女儿草儿秘密送到遥远的人家当帮工,把苗壮当作自己的孩子,才逃过了日寇奸奸的多次搜捕。日本侵华战争改变了两个孩子的生活,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小说写到1944年,11岁的苗壮正在院子里看一对燕子在屋檐下欢快地衔泥筑巢,突然日本士兵吉野带着恶狗狂吠着闯进院子,叫喊着“把八路军伤员交出来!”受惊吓的燕子叫了几声,就被吉野一枪打死,以此威胁苗壮养父母交出八路军伤员。军犬嗅出藏在院子里磨盘下的八路军伤员小周,养父大柱赶紧向前阻拦,却也被吉野开枪打死,养母英子扑上去要和吉野拼命,也被吉野开枪打伤,藏在磨盘下的八路军



伤员小周突然跳出来,大喊一声:“八路军在此!”用手早已打光了子弹的步枪与敌军搏斗……苗壮目睹了敌军肆意杀戮的惨烈场景。养母临死前告诉了苗壮他的身世,让他去找亲生父母。苗壮的童年经历使得他有着爱憎分明的强烈情感,这成为他日后英勇杀敌的精神力量。在八路军队伍里,大刘“师父”舍身炸油库的牺牲精神,让他懂得八路军抗日不是为了报私仇家恨,而是在民族存亡之际为全中国人民未来的和平和幸福而奋斗。苗壮主动要求参加八路军“三道坡伏击吉野大队”、“蛤蟆沟偷袭日军武器库”和“老峪口炸毁鬼子加油站”三场战斗,他在战斗中不断成长,从小小少年成长为一名英勇的八路军战士。

日本侵华战争妄图“亡我中华,灭我种族”,儿童的生命权和生存权遭到肆意践踏,儿童生存状态急剧恶化,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在抗战儿童小说里,描写战时儿童的生存状态,与讲述抗战英雄的故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二月谣》中少年板栗的故事就是战时儿童生存状态的缩影。小说第一章“鬼子要来了”写敌机轰炸的消息给板栗家带来恐慌。城里到处是逃难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敌机轰炸、敌军抓人,年轻人都被送去修机场,有反抗的被就地枪杀,板栗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战火中倒下,残酷的现实让板栗意识到一个朴素的道理,自己必须“活下来”,只有活着才能为那些牺牲的人报仇雪恨,才能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小说第三章题名就是“活着,活着”,“活着”有不同的活法,有的人像板栗那样以“为战斗而活着”为信念,有的人像临危不惧的林姐和舍生取义的小峰哥那样,宁愿以自己的牺牲换取更多人的“活着”,他们都是真正的抗战英雄。除了英雄形象之外,小说里还有妥协求生的许掌柜、助纣为虐的伪军队长。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影响国家民族的命运。板栗、谷雨、三壮三位少年怀着深仇大恨,在敌机轰炸中遇难的亲人们报仇,主动参加了捣毁二套口日军机场的战斗。这场战斗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摧毁了这个建立不足3个月时间的日军机场,创下了日军机场存活时间最短的历史纪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笔。

以文化叙事增强抗战儿童文学的厚重感

当代儿童文学创作者并没有亲历抗战的烽火与硝烟,抗日战争只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历史背景进入作家视野。抗战儿童小说不是为着单纯再现历史,而是不忘国耻,以史

为鉴,面向未来,守护根脉。这些作品以鲜明的文化叙事特色,深化了抗战儿童文学的生活深度、情感温度和时代高度,增加了儿童文学的厚重感。

几部作品都比较重视传统文化“家国一体”的观念,注重描写以孝道与亲情为核心的人伦人性和家国情怀。四部小说都从儿童的家庭生活写起,写战争对亲人的伤害和对家庭的破坏,写孩子们被迫卷入战争是从尽孝与保家的朴素情感开始的。《二月谣》里的少年抗日先锋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禁止15岁以下儿童直接参战。少先队蒋队长对要求入队的板栗说:“仇当然要报。你的仇,我们大人会帮你报。你们还小,现在的任务是保护好自己,平安长大,等到哪一天我们牺牲了、光荣了,侵略者还没有赶走,到那时就靠你们了。你们就是我们的指望,也是国家的指望。”最开始,孩子们还没能认识到“家仇”和“国恨”之间的同构关系。随着革命经验的不断成熟,“小战士”们逐渐意识到只有“保国”才能“护家”,自觉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去,为了未来所有孩子们都能有幸福圆满的家与国而无畏奋斗。

重视抗战历史的文化表达,关注战场以外的文化抗战,使得抗战儿童小说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得到进一步拓展。《守书人》以上海“孤岛”时期郑振铎领导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拯救珍贵文献的真实历史为素材,以郑振铎为原型塑造了藏书家、文献学家、暨南大学教授谭先生的形象,小说情节也忠于历史事实,如郑振铎等人从日军严密监控的嘉业堂等江南藏书楼秘密抢救古籍,其中3万多册珍稀古籍在香港被日军意外劫获运到东京,日本战败后,幸亏有郑振铎提供的“香港藏书目录”为证,这批被劫文物才能完整回归。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小说以此编构核心情节,以少年阿煦的成长为线索,写爱读书的阿煦从湖北随县农村跟随亲戚到上海做学徒谋生,在讲习所与暨南大学教授谭先生相识,在谭先生推荐与引导下,先后在文青阁、觉园等进步书店当学徒,秘密为“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成为谭先生的得力助手,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战史诗。

以文学之笔重建破碎的山河

重视对抗战发生地自然风景的描写,有意识地与战时山河破碎的家园作对比,激发抗战的坚定决心。当美丽家园被敌军毁灭时,抗日无需动员,家园就是战场,每个人都在前线。《江上谁家少年》就是这样一部展现长江抗战意义和聚焦

长江文化的儿童小说。故事发生在长江流域鱼肥水美的江汉平原,小说以长江边的生活为背景,以芦岭河少年“小黄鳝”的成长为主线,塑造出一个与江河、湖泊、水乡、草木相融与共、天真质朴的儿童形象,生动呈现出荆江、江汉平原生存环境的变化带给儿童生活和心理成长的影响。同时,作品融入对江汉平原的历史文化、对长江水系生物多样性的描绘,勾勒出一幅江汉平原的风俗画、自然地理图画、历史文化图画。儿童读者在了解长江沿岸抗战历史的同时,也感受长江流域的文化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传承这份宝贵的抗战精神。

重视对民间文化的吸收与运用,在对儿童抗战的诗意描写中,体现出浓郁的抒情风格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二月谣》的书名来自主人公板栗小时候奶奶教他唱的童谣,不仅表现了少年板栗的成长环境和家庭背景,强化了儿童小说的儿童性与文学性,也成为小说情节推进发展的主旋律,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被反复唱起。第一次是板栗站在山顶望断天涯路也不见爹爹奶奶回家的身影,那是情不自禁含泪而唱的忧心歌;第二次是在少年伙伴谷雨、三壮的爹娘都被飞机炸死后,板栗害怕自己也成为孤儿,那是黯然神伤的低吟,还有对爹爹奶奶的思念;第三次是在加入黄梅县少年抗日先锋队后,板栗得知爹爹还活着,被扒去修机场,那是悲喜交加的战鼓,发誓要救出爹爹;第四次是小峰哥牺牲前将情报编入童谣,不畏敌人的刺刀,向着埋伏在机场外芦苇丛里的同志们大声歌唱,那是用生命吹响的战斗号角;第五次是1939年6月少年抗日先锋队发展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第八大队,再创作的《二月谣》已经更名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八大队队歌》,那是一首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抗战之歌。一首民间童谣的演变见证了中国人民如何被侵略者拖入战争的深渊,又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反抗、扭转命运的伟大历程,生动展现了中国人民全民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英雄气概,揭示了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

讲述抗战故事,守护中华根脉,让今天的孩子了解这段历史,就是“把种子留下”,这是《二月谣》《江上谁家少年》《我本苗壮》《守书人》四部儿童抗战长篇小说表达的共同主题。新时代儿童文学作家创作抗战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不是做应景文章,而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是要让今天的孩子对抗战历史有正确的认知,不忘国耻,珍爱和平,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作者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新观察

将传统文化画进书中

□ 朱利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保持特色与个性、在全球化时代构建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的重要载体。儿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受众,如何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实现面向儿童的现代化传播,是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的重要使命。

中国本土图画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注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吸收和运用,从早期“图画故事丛书”的艺术探索,到新世纪之后图画书喷薄式的出版,从蔡皋、熊亮等绘本画家创作的中国绘本,到杨志成、陈江洪、叶俊良等华裔插画师“在西方表达东方”的创作实践,基于民间故事、童谣、寓言等传统文化精华创作的图画书,不仅探索出了一条富于中国韵味和气质、彰显中华文化特质与魅力的艺术道路,而且为传统文化在电影、电视、广播、动漫、游戏等广义叙事艺术形式中的应用与创造之外,探索出另一种新的可能。

以“花木兰”这一家喻户晓的形象为例,蔡皋创作的《花木兰》从民间故事中汲取养分,基本尊重原故事蓝本,并未进行大量的文本改编,只是在绘图上追求艺术创新。秦文君创作、郁蓉绘图的《我是花木兰》则兼用传统与现代双重叙事视角,运用剪纸、拼贴等艺术手法,丰富了花木兰的故事内涵。叶露盈绘制的《木兰辞》主要侧重于讲述“少女养蚕”的故事。曾创作《王羲之》《孔子》《良农诗》的叶俊良,在法国做图画书,也曾和克莱曼斯·波莱合作用麻胶版画的形式演绎《花木兰》,故事并没有强化木

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身份,而是赋予木兰新的生命力与自由的灵魂。由此可见,同一个故事或题材在不同作家、艺术家的笔下各有千秋,这充分展现出传统文化题材图画书作品多元演绎的可能。

图画书的现代转化和当代表达要以现代童年观念来统摄,特别注重语言的转换和故事的生成。语言方面要着重增强儿童性、韵律感和节奏感,通过增补人物之间丰富生动的对话,彰显语言表达的趣味性、幽默感和游戏精神等审美效果。在故事方面,要重新进行故事场景、人物角色、情节、结尾的设置,通过“增”“删”“改”等方式完成素材的重述:如对暴力、血腥等不适合儿童的内容的删减,以及对故事内核的妥帖处理;对含有撒谎、欺诈等不良道德和价值观的重塑;对童谣和民间故事中一些粗俗或者生硬的内容进行适当的删改。在这些方面,改编自童谣、寓言和民间故事的《耗子大爷在家吗》《三个和尚》《老鼠娶新娘》等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文与图是图画书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要在语言的运用、故事内容的增删和文本的改编等方面下功夫,还特别需要图像的处理和形式的创新。这就要求图画书的作者、绘者和编辑团队在美术设计、视觉造型、色彩与构图等方面下功夫。目前,已有很多原创图画书在图文关系上进行探索,如采用双线并进的呈现方式、提升互动参与的立体书设计,同时融入剪纸、镂刻、印染、织绣、镶嵌等美术精华,探求彰显东方韵味的叙事话语,赋予

传统内容以多元的现代内核。传统文化是族群性、集体性的文化记忆,用图画书的形式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对于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认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也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杨志成、陈江洪、叶俊良等华裔插画师创作了源于传统故事的《七只瞎老鼠》《狼婆婆》《毛驴客栈》,以及取材于文物古、传统国画、武术的《虎王子》《神马》《小鹰》等佳作。这些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图画书作品,既具有中国传统风格,又能为西方读者所接受,为更好传播中国文化和形象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启示。杨志成特别喜欢用“在西方表达东方”来阐述其创作初衷,力求最大限度地“寻求最适合每个故事精魂的画风与媒材”,这些创作都与中国本土图画书形成了互补的艺术风格。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的图画书作品,应秉持儿童性和现代化眼光,充分挖掘优势资源,进行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创新。这个过程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话和碰撞,对探索具有中国气质和中国风格的图画书美学具有积极意义。未来需要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们群策群力,将传统文化画进书中,画进孩子们的心中。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儿童图画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DK-TZD36)

